

DEVELOPING MODES AND STRATEGIC CHANGES:
A STUDY ON THE UNITED STATE OF AMERICA TODAY

发展模式与 战略变化

——当代美国问题研究

王晓路 洪舒 徐海鑫 史维 韦足梅◎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2016—2017年度指向性课题：

主要国家发展模式与战略变化——美国

Developing Modes and Strategic Changes:

A Study o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oday

发展模式与战略变化

——当代美国问题研究

王晓路 洪 舒

徐海鑫 史 维 韦足梅

著

责任编辑:周 洁
责任校对:余 芳
封面设计:严春艳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发展模式与战略变化:当代美国问题研究 / 王晓路等著.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8. 8
ISBN 978-7-5690-2167-7

I. ①发… II. ①王… III. ①美国—研究
IV. ①D7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74508 号

书名 发展模式与战略变化
——当代美国问题研究
Fazhan Moshi yu Zhanlue Bianhua
—Dangdai Meiguo Wenti Yanjiu

著 者	王晓路 洪 舒 徐海鑫 史 维 韦足梅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90-2167-7
印 刷	成都金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6 mm×208 mm
印 张	6.5
字 数	149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 <http://www.scupress.net>



Contents 目录

绪论：发展理论与问题意识·····	王晓路	001
美国经济发展模式变化的探析与启示·····	徐海鑫	070
美国政治制度的现代化进程简论·····	洪 舒	093
美国民族文化政策的发展与变化研究·····	洪 舒	115
美国社会成员研究：以墨西哥裔移民为中心·····	史 维	155
美国社会成员研究：拉丁裔移民政策及其身份困境·····	韦足梅	180
课题组简介·····		198

绪论：发展理论与问题意识

王晓路

一、历史的轨迹

发展（development）概念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科学、史学以及文化学等各分支领域的重要概念。这一概念涉及各个民族国家延续的历史进程，其中群体的组织方式和对外事务的处理方式是这一概念的两个并行不悖的重要因素。由于“发展”的对立面是“停滞”，于是，各区域的群体在其社会性发展的伊始阶段就在寻求并实施着某种发展理念。随着现代进程的加速，发展理念以及相关的实践方式也日益受到重视。而中美关系也是在一种发展的进程中呈现出不同时代的特性以及问题的不同指向。因此，从发展观视角看待并研究中美关系是一种必要的方式。

人类社会在历史进程中主要是以经济和社会管理的不同模式为其阶段性特征。对这样一种总体性特征，既可以采纳以某一代表性社会支配运作过程命名，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亦可采纳更为综合的方式，类分为自然、生产、消费和风险等几个主要的发展阶段。前者指某一

社会内部占主导地位的基本结构，后者指各个区域在历史时段的共性。但一般而言，各阶段所呈现的社会风貌与其外部条件和内在组织方式是密切相关的，其共同点是，技术的进步与普及引发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迁，而新的社会现象则需要以法理为标识的规约加以规范。于是，技术性生产与社会管理的生产往往合二为一，从而社会现象与技术以及经济模式相连，而社会管理又与支配性理念以及教育相连，由此构成社会发展阶段的合力。因而，群体间的经验总是处于相互借鉴和审视之中，其中一些可以在相互理解和融合中形成共享性发展理念。例如，全球范围内的城市是人类各群体逐渐趋同的生活空间，其形成过程就与早期的安全需求、商业作用、权力秩序以及生活方式密切相关¹，而城市管理与发展也成为各国需要持续思考的对象。概言之，组织化是区域群体社会性发展的起点。“在新石器时代，初级的群体扩张为更大的群体，而由此，生产需要组织化，人群需要组织化，消费需要组织化，分配需要组织化。”²

在各文化区域的自然阶段，群体须依靠该区域的外部条件进行地理定位，如所处的纬度、地貌、气候和物产条件等，进行适应性生存。这一早期阶段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受制于前现代技术条件和自然屏障，因而是偶然和缓慢的。适应性生存方式与创造性方式的结合是各区域的群体在满足基本生存条件之后才可能发生的。因此，生产型社会的第一阶

1 参见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王旭等译，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2006年。

2 许倬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桂林：广西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3页。

段——农业社会，依然是一种半封闭的社会形态，其依赖的条件是气候、工具、水利和土壤等。它涉及某一区域群体需要整合资源、共同完成的大型工程，如水利工程或灌溉系统，以及联合起来抵御外族的入侵或掠夺等。因此，家庭血缘与宗族信仰成为其组织方式的基础，如两河流域的古代国家就需要拥有超级村落并根据地缘性契约进行灌溉工程建设。¹各个文化区域的群体依靠自身条件形成的组织方式则维系着其文化的成长方式。文化成长往往由两种方式构成：自我成长与相互影响，早期社会阶段主要是前者。而在同样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条件下，人们会产生某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共同取向。于是，在保证共同的群体价值取向和有效的社会性生存的目的中，制度设计就成为必然，其目的主要是实现群体的价值²，而制度设计与实施亦会积淀成为一种价值传统和文化传统。

尽管某一文化区域的群体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会与周边其他文化区域的群体发生接触、认知、碰撞与融合等历史性事件，包括文化事件，但这一进程是极为缓慢的。在这一阶段中，不同文化区域往往会依据自身的条件选择适合自身的群体组织方式。如中国中原地区的群体不仅需要依靠土地与水利进行稳定的农业生产和生活方式，并且需要通过以文官系统为主的管理，以科举实施下层人士向上流动的弹性管理模式。在此制度下，民众拥有了某种上升的合法渠道并为之努力，不仅可以强化支配性观念，而且可以稳定社会状

1 许倬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引书，第25-26页。

2 参见劳思光：《文化哲学演讲录》，刘国英编注，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

态。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士大夫”阶层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实施的必然结果。

“士大夫”作为一广泛的社会称号始于两汉之际，恰好与科举（广义的）制度的成立相先后，这绝不是偶然的。所以从社会结构与功能方面看，从汉到清两千年间，“士”在文化和政治方面所占据的中心位置是和科举制度分不开的。通过科举考试（特别如唐、宋以下的“进士”），“士”直接进入了权力世界的大门，他们的仕宦前程已取得了制度的保障。¹

其实，大多数国家在发展的伊始阶段，家庭血缘是其维系性要素，因而都非常强调血缘和门第，只是实施的方式不一样。“从世界上不少国家的历史可以看出，封建制度刚刚建立时，几乎都是刚性的体制：层层分封，等级森严，强调血统纯正和门第高贵，人身依附关系严格，社会流动（无论是垂直流动还是水平流动）受到限制，权力结构基本上固定不变，行使权力的代表都同特定的等级、身份相联系。”²而欧洲各个国家大多在前现代阶段（the pre-modern）都严格按照血缘和出身，即贵族式群体序列，实施了刚性管理，迫使非贵族群体远离政治体制而转为进行商业活动。这实际上

- 1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页。
- 2 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9页。

均是外部条件和内部组织方式使然，与此同时，也与制度成本，尤其是在历史发展中制度调节成本密切相关，即“制度不变，维持制度的成本过大，旧制度将根据‘适者生存’原则而被淘汰。调整制度以降低维持成本制度的成本，有利于制度继续存在”¹。这一点也可以说明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缘由，下面还将详述。

其实，欧洲在14至15世纪一直经历着政治动荡、经济灾难、人口危机和大瘟疫等事件。14世纪初，欧洲就面临人口过剩的难题，即“欧洲的人口数量已经使得它的土地和农民不堪重负”²。随后的大饥荒和黑死病大瘟疫更是雪上加霜。在这一漫长的阶段中，中南美洲的许多食材，尤其是西班牙人在16世纪带入欧洲的土豆等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欧洲人口过多与粮食短缺的压力。这个局面直至17世纪才有所缓解并逐渐进入生产型社会的第二个阶段，亦即工业社会。尽管工业革命在18世纪得以实现，但其实际发生却要早了好几个世纪，有一个由手工作坊逐渐往行会和工厂集中的过程。这个时期也是劳工自由市场形成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黑死病的大范围瘟疫才使得原有的强行用工制度解体，形成了契约的用工方式。商品生产的无限逻辑是利益的最大化，其中成本核算是最为重要的要素。17世纪以来，生产方式不断被零碎化或部件化取代，一方面，一个工人的整体经验会在零碎化的生产过程中不断递减，另一方面，这也

-
- 1 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前引书，第50页。
 - 2 朱迪斯·M. 本内特等：《欧洲中世纪史》，杨宁等译，上海：上海社科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357页。

有利于资方聘请低薪工人，包括童工和女工，并降低培训成本，在总体成本降低的过程中提升市场占有率。所以，产业革命或工业革命带来的以机械加工、蒸汽机、电力为标识的现代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逐渐取代了经验式的手工生产与加工，并以机器方式延长了自然人的体力，并提高了速度以及精确度，因此，机器生产在极大地降低了生活必需品的成本的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的管理方式和群体的日常生活。“资本主义”（capitalism）成为概括17世纪以来社会文化现象的关键词，17至19世纪间欧洲各国的工业进程大多与此类似的历史现象。由此，竞争的方式除了血汗工厂之外，还必须不断改进技术方式和市场的占有方式，即营销（marketing）融入生产—管理整体进程中的关键性环节。于是，技术创新、经济规模以及营销方式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最初表现。在这一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转化的进程中，现代市场、用工制度、工厂及企业制度和工业组织以及金钱的历史性功能开始显现。与此同时，工业革命也引发了农业进步，即人与机器的结合。在同一单位面积情况下，现代农业提供了更多的粮食，这就让更多的人成为非农业人口，人类群体的活动中心就此从乡村转移到城市。而城市间的物流性联系形成了不同区域的现代运输方式，这无疑更进一步提升了工业生产的容量。概言之，经济进步扩大了财富分配的范围并带来空前的社会与文化变革。与此同时，产品生产方式的改变和成本的持续下降使得市场，包括海外市场的需求扩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产生不仅冲击了本国基于家庭血缘的传统农业方式，还在海外市场的扩充中以种种非法手段获取了大量廉价的生产资料，同时以自身的武力和文化

模式将海外殖民地的生产方式加以固化，以保证利益链的稳定。在这一历史阶段中，欧洲主要大国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以及生产资料的获取方式基本类似。同一阶段中的亚、非、南美洲等各国迫于自身的人口条件和社会管理方式，都先后有受制于殖民帝国的历史¹。

简言之，欧洲自17世纪以来获得了发展的契机，欧洲的发展形成全球历史中的转折点，家庭血缘的社会结构自这一时期开始逐渐被社会契约的方式取代，农业人口开始向城市转移，新型机械、动力等技术性条件成为各国十分看重的竞争性要素，社会发展的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工业化对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影响。以此为历史拐点，学术界拥有了所谓“前现代”（the pre-modern）、“早期现代”（the early modern）、“现代”（the modern）以及“后现代”（the postmodern）等概念范畴，而其中所积聚的问题和现象构成不同含义的“现代性”（modernity）。在这样一种大致的历史进程中，这些概念并无清晰或严格的时间界限，而主要与社会发展带来的认知相关，即将经验与现象进行学术话语式的对接。

先行进行工业革命和社会变革的欧洲民族国家市场方面占得了先机，由此促进了欧洲殖民体系的建立。以英国为例，1688年“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后，英国成功地将王权政治限定为传统礼仪性，即在满足民众对传统

1 参见H. L. 韦瑟林：《欧洲殖民帝国》，夏岩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See also Stephen J. Lee: *Aspects of European History: 1789-1980*,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2, Introduction.

皇室文化的依附想象心理的同时，将政治体制转为议会制君主立宪制，其中上议院为世袭或国王任命，下议院由选举产生。不同党派通过竞选争夺下议院席位，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组阁，掌握行政权并控制议会，通过多数席位控制立法权，在野党则可获得少数席位，以此监督或牵制执政党。目前两党制主要是保守党和工党通过选举轮流执政。实际上，由于历史原因，英国至1707年成立大不列颠王国，1801年建立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时至1921年爱尔兰自由邦独立，而北爱尔兰六个郡留在了联合王国内。英国的司法系统由上诉法院、高等法院和巡回刑事法庭组成，实施社会的规范程序管理。作为这一历史时期大国崛起的一个案例，英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工业革命奠定了现代生产体系和社会结构，普及了知识社会学观念，并由此奠定了近代资本主义的核心元素，即古典自由主义和社会管理的政治建制。¹与此同时，由于殖民体系的历史性惯例、商业规则、管理及教育方式在其殖民地的普遍实施以及美国的崛起，英语拥有了世界性的语言优势，在当代互联网以及科技、交通、外贸语言的通行作用下，更是加速了这一语言的流通和接受，形成了某种世界独有的文化资本。随着帝国自身矛盾的增长和经济的衰弱，其海外殖民地自19世纪末起到20世纪纷纷独立²，其国家综合国力和竞争力方面的霸主地位已难以与美国竞争。

1 有关“光荣革命”及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的社会发展模式，参见Edward P. Cheyne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dustri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 London: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6.

2 有关英国概况及具体的指标和数据，参见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卷9，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153页。

值得注意的是，欧洲诸多国家在20世纪先后都实施一种发展理念，即将税收中的一部分作为特别提款用于提供社会公益产品，形成覆盖面较广的社会性福利，将国家转为福利性国家（Welfare State）。这一术语于1894年首次使用，开始是由德国社会学家用于表述国家的社会性中必须涉及的社会保险制度等。¹该词至1909年在福利预算时被首次使用。20世纪30年代，欧美主要国家在经济萧条所引发的大规模社会群体事件的压力下，陆续实施了一些社会保障措施。“1942年英国发表的贝弗里奇关于‘社会保险与有关的公益服务’的报告，主张实行充分的免费的全民保健服务，社会保险制度和退休年金。在1945年至1948年间通过的一系列法案中，这些措施均得到落实，以后的历届政府贯彻不渝，福利国家不复成为党派政治的争议话题。”²福利制度在不同国家，如新西兰和挪威等，以及不同的历史阶段中虽然有较大的差异，但这一议题已成为当代社会管理的重要观念之一，涉及基本医疗、教育、税收、养老以及社区管理等一系列问题。已经实施多年福利制度的欧洲国家的民众对此十分看重，因而对外来移民，包括难民的涌入会稀释原有福利自然心存疑虑，所以福利稀释也成为当代欧洲难民问题的一个中心话题。而另一些国家则并不推行欧洲，特别是英国的福利制度，如美国认为这一制度在客观上会造成群体中的一些人利用体制的

1 See Merriam-Webster On-Line Dictionary, <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welfare%20state>, 引用时间：2018年2月3日。

2 亚当·库珀等：《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林勇军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826页。

缺陷而不愿多参与社会活动，也不愿意以诚实劳动换取生活必需品等。但无论何种情况，基础教育、用工制度、社会保险、医疗制度以及养老模式等，都是各个民族国家必须面对并且需要进行针对性处理的。

因此，工业化与现代化成为19世纪后半期之后全球化的两大标识，并形成一种类似的世界经济文化的现象。其主要有如下特征：其一，充分重视技术的发展，重视技术在军工、生产和民用方面的普及和替代性功能。对群体的社会化生存重视分层管理，采纳具有创新性的组织方式，实施持续的制度设计创新，因为制度创新是最为重要的创新。其二，在经济活动中，以持续降低成本、吸纳新技术、使用高效能源和加工工艺的专业化管理模式开始突显，使相关经济活动有利于社会化大生产。其三，群体的社会意识、国民素养成为经济活动中的必备要素，现代法理的确立与普及，公立教育、文化艺术等社会性功能获得不断提升，并使这一功能有利于法理的确立与实施。其四，由于技术更新速度加快，社会分层速度随之变化，人口流动，包括被动与主动两类，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并由此出现人口管理的跨文化模式。这一点在美国尤为明显。但目前欧洲最大的问题是人口增长缓慢、福利制度固化问题，而与此同时，途经土耳其和地中海的难民源源不断地进入，造成国家与区域之间问题的叠加，情况变得棘手，也使得欧盟内部出现巨大的裂痕和矛盾。这是因为，难民和非法移民在当地人口中的占比越来越高，他们不仅稀释了原有的福利配额，而且给当地社会管理、就业及就业培训、住房、教育、医疗和宗教信仰等带来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根据国际移民组织的报告，在2011

年前，每年欧盟经过审核最终接收的难民数量基本控制在10万人以内。但自2012年起，难民人数开始逐年急剧增加。其中，2014年进入欧洲的难民达到28.3万人，2015年则超过100万人。仅2016年就有约37万中东和北非难民抵达欧洲，其中超过7.5万名难民在希腊和巴尔干半岛的西部国家滞留。2017年截至8月共有12万名移民和难民涌入欧洲，有两千多人在途中死亡。其次，欧洲国家人口种族比也发生了快速变化。2016年18个欧盟国家人口上涨，德国每1 000名居民中，净增长7.6%，瑞典14.5%，卢森堡19.8%。占欧洲总人口12.9%的英国人口增长了6.5%，净增加42.6万人。截至2017年，欧洲出生人口数量同死亡人口数量基本持平，这意味着人口增长主要归于移民人数的增加。社会管理成本等方面的预算外支出也大幅度上升。被迫接受难民的国家不仅需要持续应对社会管理临时性高成本，而且社区安全因素的下降和资源溢出也造成了部分民众的强烈不满，这一点恰好是欧洲右翼政治势力所特别期待的，因此，可以看到欧美右翼势力在近年间的政治选举活动中明显抬头。当代难民潮给欧洲政治、经济和安全带来巨大冲击，严重威胁欧盟内部的团结和稳定，英国脱欧即是这一矛盾的集中显现。¹区域内部以及区域之间的矛盾上升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来的高点，由此标志着“后9·11”（Post-9.11 Era）时代的来临。这个时代的公共安全指数跃升为国际竞争指标中的第一位，而原有的自然灾害风险区指数已降到次要位置。当代全球危机不仅促发了有关安

1 See “Brexit: All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he UK Leaving the EU”, <http://www.bbc.com/news/uk-politics-32810887>, 引用时间：2018年2月3日。

全观的新概念，提高了社会管理成本，而且造成了政治、经济、贸易、安全、社会管理等全方位的影响，至此族群矛盾与地缘政治交织在一起。

二、美国发展概述

美国与欧洲的情况有所不同。美洲大陆是一块晚起的发展区域。自哥伦布发现美洲后，欧洲几个主要的国家，西班牙、法国、英国等先后到达美洲大陆。从16世纪开始，欧洲一些国家的民众陆续开始移民，至18世纪30年代英国在北美东部陆续建立了13个殖民地。随着移民的增加和非洲奴隶的输入，殖民地的人口开始增长，经济也有了一些发展。美国经过独立战争后，工业革命开始在北部各州展开，城市规模开始扩大，同时吸引了大量的欧洲移民。南北战争后至19世纪晚期，美国经济开始高速发展，迈入强国之列。在国家发展中，内部动荡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指数，动荡期越长，后期对国家的影响就越大。美国本土在历史上一共只有两次战争，即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两次战争时间都比较短，其对国内的破坏性影响不大，也没有影响到与欧洲的贸易。其实，世界范围内的殖民体系的解体除了内部反抗宗主国之外，还有维系成本的原因。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 1776）¹在国家制定政策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国富论》提出成本核算是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

1 参见亚当·斯密：《国富论》，孙善春、李春长译，北京：华侨出版社，2010年。

因素，如果贸易带来的利益不低于战争所获的利益，那么战争就不会是首选方案。美国独立后经济持续的发展还在于其地理条件，即美国拥有天然、独特的地缘优势。全球最大的两个海洋，太平洋和大西洋将其与欧、亚、非洲和大洋洲隔离，美国和北部的加拿大拥有全球国家间最长的国境线，但两国均不设防，因此国防成本很低。美国南边都是一些不具备与之抗衡能力的发展中国家，其中仅有一个古巴在20世纪60年代与美国有过导弹危机，但在近年两国恢复了外交关系。这种世界少有的地缘优势也影响到美国早期的军政思想，“从独立战争直至二十世纪上半叶，得天独厚的地理、地缘优势使美国人几乎不需担心其安全，自由主义始终主导着美国及其军政关系，美国人只知道自由主义及其少数几种变体，而自由主义反对维持大规模的常备军，认为军事制度和军事职能必然威胁自由、民主、繁荣与和平，只关心什么样的军政关系模式能与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兼容”¹。然而，这种传统的军政思想自冷战开始至“9·11”以后则完全改变了。

在美国的历史进程中，它先后利用欧洲大国与美洲各国的矛盾，完成了世界史中最为廉价、最大规模的国土并购，从大西洋沿岸扩充到西部太平洋沿岸地区，在不长的时间里极大地扩充了疆域，形成了东西、南北延伸的地理区：大西洋沿岸平原、阿巴拉契亚山脉、内地平原、西部山系以及贯穿性河流。其扩充后的广袤疆域使其拥有了多种自然资源：

1 欧树军：《美国军政关系的变与不变》，《读书》，2017年7期，第4页。